

东盟—中国—日本的合作及东亚的未来

唐世平 周小兵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活力和信心遭到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东盟在亚洲未来的地位，特别是它在东亚的作用就成了国际关系讨论中的热门话题。除了讨论东盟是否能恢复过去的经济活力之外，这些讨论关注更多的是，如果东盟能恢复过去的经济活力，它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扮演推动地区内和地区间合作的核心角色？如果不能，东盟的出路在何方？^①

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中国同样也关注东盟作为一个组织及其各成员国的未来。这是因为，东盟对中国有着显而易见的战略意义：东南亚国家既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同时也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势力试图争取的战略前哨基地。

另一方面，中日关系似乎陷入了中美日之间永远跳不出的恶性动态中。这集中体现在，日本和美国一方面在不断加强其军事同盟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军事同盟还不够紧密；另一方面，中国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日美同盟的强化有相当多的成分是针对中国的，从而使中国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上中日两国间沉重的历史恩怨，中日关系的前景更显得暗淡。

上述的各个问题粗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但由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它们之间是密切互动的。^②因此，当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大战略时，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东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东盟是否应该也能够成为中日合作的促成者，从而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过程，在为东盟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为中日关系及整个东亚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东盟在东亚：风光不再

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腾飞和其后的产业迁移使得东盟国家逐渐成了东亚，乃至世界的低成本制造中心，经济也因此得到

了迅速发展。冷战结束后，东盟又在没有任何明显直接的外来威胁的形势下，依靠东盟领导人的胆略和建立在经济地位上的政治地位，在影响地区事务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声望。东盟和东亚的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也许只是昭示了历史的必然。因为今天再回头审视时，我们会意识到，在过去的十年间，东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给东盟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后果是：东盟各国尽管在金融危机后基本上都恢复了经济增长，但东盟在金融危机前所拥有的在地区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不会随着东盟经济的复兴而恢复。

这些变化将从根本上动摇东盟领导人把握未来的思维方式。

（一）经济领域

在经济领域，即使重新恢复增长势头，东盟也不大可能再扮演其过去的角色。这是因为，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低成本制造中心”，这一地位已经为中国（也许还将有印度）所占据。我们只需考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纺织和电子业）的迁移过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是世界上纺织和服装生产与出口的最大国家。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进入它们的国内市场给予重重限制。中国成了纺织品出口受限制国家最多、受限产品范围最大、配额结构最不合理的国家。^③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将配额全部用完，因此90年代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相对下降，在欧洲市场上的份额也几乎没有增长。但即使如此，东盟在美欧纺织服装市场的份额也基本没变，没有因中国产品受到限制而相应扩大其份额。其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正在

迅速扩大它们在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份额。中国加入 WTO 以后,其纺织与服装产品所受的出口限制将逐步取消,中国势必将再次扩大在世界纺织服装市场的份额,东盟将受到中国产品和南亚、拉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夹击,更加难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在东亚市场上,由于日本将大量国内纺织服装业转移到中国而不是东盟,日本进口的纺织服装产品 62% 来自中国,而东盟仅占 8% (1999 年数据,见表 1)。

表 1 90 年代中国与东盟在美日欧纺织服装进口中的份额

产品来源和去处	年度	美国	欧盟	日本
东盟	1999	10.37	4.76	8.36
	1996	10.98	4.27	8.93
	1993	11.81	4.32	7.83
中国	1999	11.21	6.74	61.68
	1996	12.48	5.40	51.38
	1993	16.07	6.64	43.72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UN COMTRADE 数据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经济数据库(International Economic Databank,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在电子产品制造方面,根据日本樱花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电气和电子行业的制造能力已经于 1999 年超过东盟,占到了整个东亚这一行业总产值的 20%,从而跃居新加坡之前,成为第一。⁽⁴⁾ 日本电气和电子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和工厂数都已经大大超过其在任何东南亚国家的投入:日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占到了其在整个东亚的 50%,工厂数占到了 32%。加上转移过来的许多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生产能力,中国正在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在整个世界的电气和电子出口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1997—2000 年间,中国几个主要产品类别的产值均有大幅上升,与此相比,东南亚主要国家除马来西亚在计算机硬盘上显著增长外,其它各主要领域均增长有限,

甚至出现了下降(表 2)。

表 2 的数据还表明,过去产业制造能力的迁移模式,即从欧美日本先迁移到四小龙,然后再迁到东盟其它国家的模式,也已经被打破。一些产业的迁移链已经开始绕开东南亚国家,直接迁到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被全球产业的迁移链所割弃,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最为显著。

更严重的是,中国像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链中的一个终极点,因为中国始终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替换已经积累了学习经验因而需要更高工资的劳动力。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远小于东亚其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这样,即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向更高的层次转移,它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中的竞争力也不会削弱。因为,要使中国全部而不是某一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实际收入都高于东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中的“黑洞”,东盟国家很难再重新夺回它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级“低成本制造中心”的地位。正如大前研一指出的那样,如果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不能够面对中国正在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制造中心的事实,并且准备好有效的措施,亚洲,特别是东盟将面临新的危机。⁽⁵⁾

在吸收外资方面,中国相对于东盟的优势在金融危机后也更为突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在金融秩序方面也更加稳定,使得如今流向东亚(日本除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有近 70% 都流向了我国。⁽⁶⁾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有限的经济总量和分割的区内市场,也不大可能为东盟国家带来更多的外资或促成更多的区内贸易。这些都将进一步削弱东盟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重要初衷已经难以实现,东盟在许多制造领域的竞争力已经难以恢复。

(二)政治 安全领域

在相当一段时间,东盟因为拥有李光耀和马哈蒂尔这样具有哲人威信领导人,加上其经济活力和内部凝聚力,在地区

表 2 东亚占全球主要电子电器产品总产值的比例(%)

	彩色电视		录像机		DVD		移动电话		移动电脑		台式电脑		硬盘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日本	4.9	3.6	11.8	7.6	86.6	45.7	21.4	12.5	28.9	25.3	6.4	3.7	12.7	9.3
韩国	11.9	7.8	11.4	7.7	0.0	1.8	7.3	15.9	2.3	2.6	2.9	5.3	2.9	6.4
中国台湾	0.4	0.6	0.6	0.4	0.0	1.2	0.0	2.0	33.3	51.6	17.7	19.6	0.0*	0.0*
新加坡	1.5	0.8	0.8	0.0	0.0	2.7	0.7	2.1	11.2	1.8	4.6	3.1	47.0	33.4
泰国	5.8	6.1	6.9	6.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3	14.7
马来西亚	8.3	8.8	18.6	18.6	0.6	22.3	0.2	1.0	0.2	0.4	1.7	1.6	14.8	3.7
印度尼西亚	3.1	2.8	11.6	13.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菲律宾	1.2	1.1	0.4	0.5	0.0*	0.0*	0.0*	0.0*	1.8	1.8	0.0*	0.0*	6.8	12.1
中国	19.4	24.0	15.5	21.2	4.3	19.2	4.9	8.7	0.4	1.4	6.1	9.6	2.0	7.5
整个亚洲	51.6	51.9	65.7	68.4	4.9	47.2	13.1	29.9	49.2	59.6	32.9	39.3	84.6	87.8

注:* 为被产业迁移链所跳跃过的国家。

资料来源:Junko Takeuchi(2001)。

政治事务中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发起的东盟地区论坛 (ARF) 等地区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为促进东盟本身和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天,东盟的一些国家面临着许多国内问题,这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盟的几个主要核心国家都将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事务,难以在地区事务中投入太多资源。越南等三个印度支那半岛国家的加入又使得东盟内部事实上形成了海洋和陆地两块东盟,其内部凝聚力在短期内也难以恢复。这样,东盟作为一个组织的影响力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令人欣慰的是,东盟面临的外部地区安全环境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东盟国家最为担心的外部挑战,即中国经济增长给东盟带来的安全威胁,始终没有来临。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和表现已经让东盟国家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仅不大可能成为东盟国家的安全威胁,反而还能为地区带来稳定。中国在 ARF、APEC、ASEM、10+3 等各种组织和机制中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建设性作用,都证明东盟启动 ARF 的初衷已经基本实现,那就是中国已经因为在 ARF 的积极参与而被“社会化”(socialized)了,而且中国敢于承担必要的责任。^[7]

那种认为中国会因为能源紧缺而采取向东南亚扩张的危言耸听的预言没有到来,也不大可能到来。在中国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仅仅是美国的 1/22 时,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一方面推行节能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则采取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用中国国有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独立或与其它跨国公司联合在海外开发石油资源。^[8]更何况,“亚洲能源危机”论是建立在人类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找不到更廉价的和丰富的替代能源的假设上的,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它显然没有多大说服力。

总的说来,尽管东盟花费了很多精力,企图通过“接触”来同化 (assimilate, incorporate)、围堵 (contain)、节制 (constrain) 中国,^[9]但事实上,中国对东盟形成安全威胁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些敌对势力强迫东盟与中国为敌,同时中国不得不奋起迎战。安全领域是中国最不可能威胁东盟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也更因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许多东盟人士在这一点上显然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中国对东盟的挑战更多是经济的。这种挑战与始终未成为现实的安全方面的挑战不同。中国对东盟的经济竞争压力不取决于中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全球经济中的资本和产业链的转移。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国相对东盟,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市场,有着储蓄率和受教育程度都较高的优势,如果说在金融危机前还不够明显的话,如今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东盟的选择

那么,东盟的出路在哪里?

从经济角度来看,东盟各国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都不足以

国际经济评论 2001.11-12

支撑一个自我驱动的经济。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东盟必须整合到一个地区性或全球性的价值链中去。

新加坡与东盟区域外一些国家或地区最近签订的许多双边贸易协定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但在东盟的成员中,恐怕也只有新加坡才能够脱离东盟,能够整合到其它地区 (欧美) 的产业价值链中去。

第二种选择是,东盟国家通过正在推动的内部贸易自由化进程,力求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真正统一的大市场,以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加抗御外部经济冲击的经济纵深。但是,东盟内新老成员之间的差距过大,新成员在短期内是难以将其经济完全对外开放的,否则他们不仅难以承受外部市场的冲击,甚至连东盟内的竞争都无法应付。因此,这种选择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

在以上两种选择之外,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东盟通过与东亚其它国家及地区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谋求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从东盟的贸易走向看,尽管美国和欧洲两个地区一直是东盟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但是东北亚三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表 3),仅 2000 年上半年,东盟六国和东北亚三国的双边贸易就比 1999 年同期增长了 38.2%。^[10]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未来一定是在亚洲,而其中最现实的是东北亚的三个国家。

表 3 三大贸易伙伴占东盟贸易的比例 (%)

	总贸易			出口			进口		
	1998	1999	变化	1998	1999	变化	1998	1999	变化
美国	26.07	26.24	8.3	24.50	20.63	9.7	25.35	23.69	0.3
欧盟	18.6	20.86	20.6	15.99	15.47	3.6	17.42	18.41	13.5
东北亚 3 国	20.87	21.77	12.25	32.31	33.97	12.45	26.09	27.29	12.36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网页, www.asean.or.id

在安全或政治领域,东盟仍然需要保持对各个大国 (包括中国) 的谨慎,继续执行在大国间建立力量平衡的地区安全战略,使地区事务不为任何一个大国所主宰。这样的地区力量格局不仅符合东盟的利益,也是中国所乐见的。

但这种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的战略本身并不意味东盟国家需要过多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各大国之间踩钢丝。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大国之间的平衡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几乎是自动的,大国本身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平衡彼此。^[11]事实上,如果大国之间的相互平衡政策太过火,反而会给该地区带来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对东盟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作为中等或小国家的东盟国家,往往会在大国纷争复杂的时候感到无所适从。

因此,只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有利于东盟,东盟甚至应该促成这种合作。东盟不能再停留在已经逝去的世界里。

于是,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和政治方面考虑,东盟的出路都不再是在大国间搞平衡,而是应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它在东亚的位置。东盟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或是大国会主宰地区事务,而是东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如何在世界

和地区的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角色。

东盟作为中日合作的促成者?

如果亚洲,特别是东亚才是东盟的未来所在,那东盟又该如何塑造一个新的东亚?

与一些地区相比,东亚是一个令人悲观的地区。东亚在全球区域化日益深化的潮流中,正在急速地落后于欧洲、北美,甚至拉美。

在东盟遭受了危机的打击而且面临众多内部问题的今天,10+3机制的出现无疑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了一线曙光。然而,如果没有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合作,10+3机制本身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换句话说,在10+3框架内,中日两国关系如果不能进入一个良性状态,10+3框架最终有可能和众多的多边机制或组织一样无疾而终。一个没有建立在法国和德国良好合作基础上的欧洲共同体或欧盟将是极其脆弱的。同样,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良好合作关系的“东亚共同体”肯定也是空中楼阁。

中日两国显然都意识到了两国关系对双方和整个地区的重要性(至少对东亚来说,中日关系比日美和中美关系更重要)。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家间缺乏信任,国家间的合作尽管在许多时候对双方是有利的,但达成合作往往是困难的。^[12]加上中日两国之间如此沉重的历史恩怨,中日间要实现真正的和解就更加困难。所以,尽管中日两国都有相当多的人士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历史问题和它引发的国内政治问题,使得两国始终无法超越目前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得过且过的合作。

即便如此,中日之间的合作并不一定是毫无希望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合作理论认为,在应该合作的双方之间缺乏内在的动力时,如果存在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外来的合作“促成者”(“enforcer”),往往会使合作成为可能。^[13]

在中日之间能担任合作推动者的国家(或集团)不外乎三个:美国、韩国、东盟。且不说美国似乎并没有任何打算推动中日间的合作,即使美国真的想推动中日合作,其作用也会因为中国担心美国联合日本制约中国而大打折扣。类似的问题同样会制约韩国的作用,只不过这里是日本担心韩国联合中国制约日本。如此东盟应是中日双方最有可能接受的外来的“合作促成者”。

东盟要成为中日合作的促成者,一个显然的问题是,目前东盟内部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国内政治的考验,东盟作为一个组织的活力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东盟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和能力来转变它们的战略眼光呢?

我们的回答是,正是因为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东盟才有可能重新审视它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如果东盟始终保持着过去的势头,它将继续过去的政策,很难学习新的战略。

更重要的是,东盟成为中日之间的合作促成者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这就是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的10+3机制。

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是最早意识到东亚的未来取决于

中日两国能否达成和解的人士之一。因此,他提出了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希望以此将中日两国置于同一个合作框架内。马哈蒂尔当然很清楚,日本必须是该组织的经济主导,但他却选择了当时的李鹏总理,在李鹏访问马来西亚时提出EAEC的构想,并争取中国的政治支持。这样的外交举动恐怕不是偶然的。^[14]

尽管EAEC在当时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但今天,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如今这一梦想叫10+3而已。如今的10+3框架不仅为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广泛合作提供了机制,也同样为中日两国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合作机制。

也许在东盟集团遭受了危机的打击,内部团结也不再坚定的今天,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一机制对本地区未来的重要性,但10+3框架下取得的进展至少给东盟提供了一些作出选择的启示甚至保证。10+3框架下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合作取得的进展使东盟有可能在一个更广大的空间内找到新的位置,脱胎换骨而获得新生。

东亚合作并不需要一个新机构,而是需要在10+3框架内采纳新的思维。作为10+3机制的发起人,东盟国家并不需要放弃其在10+3框架内的主导权,而是应该改变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策略。那就是东亚地区的合作乃至最终一体化,必须是建立在“以东盟为主要推动者,以中日合作为基石”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就要求,东盟国家决不能对中日关系如今的状态坐视不管,更不能幸灾乐祸,而是要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在10+3框架下作实质性改善。

东盟的选择和意义

(一) 东亚的全球地位

经受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东盟,其未来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大概有三种选择:退却、继续固守已经不再成立的角色、或者通过深刻的思考然后承担新的历史重任。

作为一个拥有五亿人口,总产值达到6000多亿美元的广大地区,东盟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打击就甘愿从此消沉下去。作为曾经在地区事务中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为地区合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东盟,也不应该消沉下去。东盟能够也应该为地区未来的发展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这里提出的东盟应该推动中日合作的建议决不是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听任其它大国摆布,而是希望东盟意识到其过去所执行的战略已经不再适用。在政治上,东盟不大可能再次成为地区事务的主导力量;在经济上,东盟也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级的“低成本制造中心”。因此,东盟必须扮演新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东盟过去执行的策略已经不再适应全球各重要地区正在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东盟本身即使一体化后,仍然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有足够的经济分量。只有已经启动的以10+3框架为雏形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过程,才是东盟,也是整个东亚的未来所在。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在不久的将来,在东亚将同时出现中

国和日本两个并立的经济大国。这预示着东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将给东盟和整个东亚带来许多的现实机遇。

日本和东盟之间业已存在广泛的经济联系(日本和东盟的贸易额是中国和东盟贸易额的四倍)。日本通过资金和技术输出,已经将东盟融入到其“雁型经济体系”内。将其与日本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扩展到中国和韩国,只是东盟“开放区域主义”的继续。

与此同时,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仅2000年,中国的进口就惊人地增长了550亿美元),而东盟最早的六个成员国和中国的贸易在1993—1999年的六年内增长了3.5倍。^[15]在中国的对外商品贸易中,东盟的比重从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其中,东盟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从5.7%上升到6.9%;东盟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从6%上升到9.9%。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增长趋势还将继续并有所加速,因为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约有50%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容量还将给东盟提供新的机会。中国入世将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其中部分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将给东盟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机会。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幅度将大大提高,对东盟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会有较快的增长。中国还能东盟提供更加廉价的大量半成品、机械设备、零部件等,降低东盟在这些方面的成本。

这样,在与东北亚三个国家逐步形成经济合作实体后,东盟一方面将能够依靠本地市场的发展地区经济,另一方面,将能够有选择地发展其工业集群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东盟推动中日两国合作又将反过来给东盟,以及整个东亚地区带来福祉。

这样的思想显然也符合东盟国家提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我们的建议只是在东盟已有的战略思维上更进一步。东盟应该意识到,东亚国家必须在推动中日合作深化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共同体。在一些对于东亚至关重要的事务(特别是经济和金融合作领域)中,东亚国家只有先依托自己的力量来形成一定的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才能够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其它地区的经济体进行平等对话,并赢得尊敬。

建立在“以东盟为主要推动者,以中日合作为基石”的东亚合作乃至一体化,将为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东亚。这个未来的东亚也许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一个文化多元、历史积淀厚重、曾经一盘散沙的地区,能够超越文化、历史、恩怨,塑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其意义甚至要超过基本上属于同一文化的欧盟。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也将推动APEC和ARF未来的主要职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组织是让非东亚国家有机会参与到东亚的各种事务进程的一个机制,但不应该成为来自东亚之外的国家或集团左右东亚事务的地方。这些组织之所以有活力并能保持政治上的吸引力,就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东亚之外的国家或集团左右。

对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未来构想,最有可能担忧的是美国。但是,在10+3的框架内推动中日韩和东盟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不是要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也不符合东亚国家的利益,因为东亚需要美国的参与和存在。10+3框架下东亚合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东亚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不是要取代当前主导亚太安全事务的中美日三角关系,而是要在经济合作和区域化等问题上,用一个多边的机制取代矛盾重重的三角机制,从而能让中日两国从某种程度上逃脱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恶性行为怪圈。

美国需要接受的,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即东亚的许多事务要更多地依靠东亚国家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就像欧洲正在发生的那样。

(二)中日关系 塑造未来

中日关系应该尽早地迈出目前这种仅仅靠双边贸易维持的脆弱基础,因为中日之间存在着比中美之间更加紧迫的相对力量对比变化(power shift)。^[16]中国的国民总产值2000年已经达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已经是日本经济总量的一半。在未来的10~15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有可能超过日本。

尽管中国的科技水平和人平均收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落后于日本,但中日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地位变化会给双方,特别是相对力量下降的一方(日本)带来相当的心理压力。一部分日本人士确实担心中国在综合国力超过日本后,会通过重新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来寻求在东亚的霸权。

中国如果能和日本共同建立一个机制化的地区经济秩序,将能有力地向日方表明,中国不想等到强大时找日本秋后算帐。中国愿意与日本及其它东亚国家一起,从地区稳定和发展出发,在日本经济在亚洲仍处于主导地位时,建立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当然,中日之间的合作能否突破纯经济合作的状态,最终要取决于日本能够正视其过去的侵略历史,勇敢面对过去,从而使中日两国能够结束历史恩怨,超越仇恨而共建未来。东盟能够在此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让中国和日本先在一个多边合作的机制下相互学习合作,从而在时机成熟时,迅速加快中日合作的步伐,并将合作推向更深的层次。东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是原初的推动作用。

因此,目前中日各自与东盟搞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只能是中日与整个东亚融合的开始,绝不能是解决东亚问题的最终回答。正如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提出的,对于东亚的未来,中日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面对全球其它各大地区的贸易竞争,中日两国能否在东盟的帮助下不辜负这一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的未来。

中国和日本应该庆幸,东盟国家已经在多边合作机制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而有可能帮助中国和日本走出仅仅停留在双边合作或更糟的三角关系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历史恩怨如此沉重的中日两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东盟各国对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融合有着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绩,如今是中日两国接过火炬的时候了。

结语

在中国的大战略中必须让东盟承担重要的角色,还是因为中国的大战略中必须包含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今,流向东亚的外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我国,而流向东南亚的投资则严重滞后。尽管这种现象似乎对我国是有利的,但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滞后因而会存在许多社会问题的东盟,最终将对包括我国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的经济前景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无法扮演积极的角色。我国不应只顾自己发展,而应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带动整个地区的共同发展。我国必须为东盟国家的未来发展作一些长远的考虑。

要实现本文讨论的战略目标显然并非易事。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东盟作为一个组织,以及东盟所有的或主要的成员国能否接受这样的一种战略思想转变。目前东盟面临的困境给了东盟一个学习的机会,使得东盟有可能接受一种新的战略思维。但是,我国也必须尝试说服东盟接受这一战略。

其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战略举动已经使一些东盟国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但这种信任仍然不够广泛和坚实。我国必须在双边和多边的场合继续执行与东盟各国友好睦邻,共同发展的政策。我国还必须表明,即便强大了也不追求东南亚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我国并不反对,也不排斥其它大国,尤其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国也不反对东盟试图约束其它大国可能存在的野心战略,我国所反对的只是不平等对待我国,我国所追求的仅仅是一个对我国没有敌意的,从而能够共图和平与繁荣的东南亚。

最后,由于能否达成中日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最终取决于中日两国,因此,中日两国还必须努力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东盟的努力有所结果。

总之,这里提出的“新思维”对东盟、我国和日本都是一个崭新挑战,需要智慧、耐心和坚持。如果确信东亚的未来确实取决于三方能否达成广泛的战略合作,那么,从现在起就应该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注释:

[1] 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John Garofano, “Flexibility or Irrelevance: Ways Forward for the ARF,”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CSEA)*, Vol. 21, No. 1 (April 1999), pp. 74 - 94; Khoo How San, “ASEAN as a ‘Neighborhood Watch Group’,” *CSEA*, Vol. 22, No. 2 (August 2000), pp. 279 - 301.

[2] 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3] 余永定等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180—1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Junko Takeuchi, “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Industries in Asia,” *Pacific Business and Industries (Tokyo)*, Vol. I, 2001, pp. 38 - 83.

[5] 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Growth Weigh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HT*, August 18, 2001; Kenichi Omahe, “Asia’s next crisis: Made in China,” *Strait Times (Singapore)*, August 2, 2001.

[6] “China’s Economic Power: Enter the Dragon,” *The Economist*, March 10, 2001.

[7]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l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XXXVIII, No. 5 (May 1998), pp. 425 - 440.

[8] “China Wins Sudan Oilfield Project Bid,” *Xinhua News Agency*, January 31, 1997; Ahmed Rashid and Trish Saywell, “Beijing Gusher: China Pays Hugely to Bag Energy Supplies Abroa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February 26, 1998, pp. 46 - 48.

[9] Allen S. Whiting, “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4 (April 1997), pp. 299 - 322;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7 - 135; Jusuf Wanandi, “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Survival*, Vol. 38, No. 3 (Autumn 1996), pp. 117 - 28.

[10] 第三次东盟—中日韩贸易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May 4, 2001, Siemreap, Cambodia) 联合报告, 东盟秘书处网页, www.asean.or.id

[1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6.,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 - 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2]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January 1978), pp. 169 - 214. Also see Harris R. Wagner,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June 1983), pp. 330 - 346;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and Economic Affairs,” *World Politics*, Vol. 37 (October 1984), pp. 1 - 23.

[13]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14] Joseph Chin Yong Liow, “Malaysia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 the maturing of a partnership,” *Asian Survey*, Vol. XL, No. 4 (July/August 2000), pp. 672 - 691.

[15] 东盟秘书长 Rodolfo C. Severino 于 2001/6/9 日在广州发表的讲话, “ASEAN and China - Partners in Competition,” 东盟秘书处网页, www.asean.or.id

[16] 《中日关系的大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徐长文教授采访录, 载《中国经营报》, 2001年5月1日, 总第1323期。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